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老龄友好型社区： 理论演进与实践进展

周佩玲¹, 李悦²

1.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建筑学院, 深圳 518055

2.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北京 100872

摘要 将积极老龄化概念的发展历程作为研究老龄友好型社区的时间序列与理论分析框架, 结合国内外相关文献与实践案例, 总结不同阶段下老龄友好型社区的理念演进与实践特征。研究发现: 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实践探索经历了从“机构化”的老年护理中心向“去机构化”养老社区的转变过程, 至今发展为在地化养老社区。研究关注点从单一追求物质空间环境对老年人的工具性支持, 到注重物质空间与社会环境相结合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社会价值实现与社会融合支持的转变, 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步展开学科交叉与跨部门合作。中国在积极老龄化视角下发展老龄友好社区应当注重老年人的价值与社会参与。

关键词 积极老龄化; 老龄友好型社区; 社会参与; 多元主体合作

20世纪70年代以来, 伴随着全球生育率下降与预期寿命的提高, 人口老龄化超越国别与地区, 开始成为全球现象^[1]。预计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从2000年的7%迅速提升至2050年的16%、2100年的22%^[2], 全球老龄化形势日趋严峻。为更好地促进积极老龄化的实现,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2005年在全球33个城市发起“老龄友好型城市”合作项目, 首次提出“age-friendly city”概念^[3]。社区是城市的基本空间单元。因此, 从社区层面推进积极老龄化成为当下世界各国响

应老龄友好型城市、满足老年人多样化需求的重要物质空间载体。西方各国从20世纪60年代起陆续出现了机构化养老社区以解决部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 但早期养老社区对老年人的心理感受与社会参与的关注有限。伴随着积极老龄化理念的深入推进, 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出现为实现积极老龄化, 解决老龄化问题, 尤其在实现老年人社会参与及自我价值实现方面提供了新思路。一些发达国家的老龄友好型社区实践出现了一系列成功案例, 老龄友好型社区的探索成为全球社会应对老龄化

收稿日期: 2020-11-11; 修回日期: 2021-02-24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901185);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新引进高端人才财政补助科研启动项目(11409005)

作者简介: 周佩玲, 副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健康地理学与健康城市, 电子信箱: zhoupeiling@hit.edu.cn;

引用格式: 周佩玲, 李悦. 积极老龄化视角下的老龄友好型社区: 理论演进与实践进展[J]. 科技导报, 2021, 39(8): 17-25; doi: 10.3981/j.

issn.1000-7857.2021.08.002

问题的重要方向。

近年来,中国老年人群体正在迅猛增长,65岁以上人口将在2022年达到总人口的14%以上^[4],届时中国将正式步入中度老龄化社会。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规模大、速度快的特点^[5]。不仅如此,中国老龄化社会一方面受到传统儒家文化的影响,孝道在家庭价值观中根植^[6];另一方面受到市场化以来西方文化的冲击,传统价值观逐步式微^[7]。大量的老龄人口、多样化的养老需求、传统与当代价值观念的激烈冲突意味着中国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建设即将面临巨大挑战。传统儒家文化中的孝道观念的根植与社区中大量具有主观能动性的老年群体也为建设老龄友好型社区带来了机遇。对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构建以“价值创造”为导向的积极老龄化战略,建设具有老年人价值创造空间的老龄友好型社区^[8]。

积极老龄化概念为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发展提供了理论框架^[9-11]。据此,本文以积极老龄化的理论演进为线索梳理不同阶段老龄友好型社区的研究进展。

1 早期积极老龄化理论与“避难所”式养老社区

积极老龄化概念最早可回溯至1961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 Havighurst^[12]提出的“成功老龄化”(successful aging)。这一概念主要针对20世纪中期欧美社会大量存在的消极老龄化观念以及对老年人的歧视(ageism)而提出^[13]。20世纪中期,欧美国家受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影响,逐渐失去劳动能力的老年人被贴上了“贫穷”“疾病”的标签,被视为社会的“包袱”。作为“积极老龄化”的初始阶段,成功老龄化概念聚焦于老年人的个体层面需求,总结并提出了老龄化过程中应当注意的身体健康核心指标,同时强调老年人应当在个体和社会层面中获得满足感与成就感^[12-14]。成功老龄化是老龄化价值观由消极转向积极的重要标记。

早期的老年社区主要以避难所(asylum)机构的形式存在。1922年,美国共有救济院(almshouses)

2353家,覆盖不同年龄人群,且老年人占据较高比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量老年人流离失所,住房条件普遍较差,生活环境恶劣。英国、美国、苏联、日本等国家纷纷制定了有关老年人的政策法规。1956年美国修改联邦法,为低收入老年人提供特殊帮助^[15];1963年日本颁布《老年人福祉法》^[16];1965年,美国伊利诺伊州颁布了《美国老人法案》(the Older Americans Act, OAA),实施社区照顾计划(the community care program, CCP),为60岁及以上的日常生活自理困难者提供居家照顾^[17]。随着“成功老龄化”对老年人健康的逐步重视以及医疗专业化程度的显著提升,对老年人进行疾病救治与生活护理相结合的机构化护理(institutional care)模式出现^[15]。此后,美国医疗养老机构由1966年的1.4万家迅速发展为1990年的2.5万家^[15],机构型养老机构迅猛扩张。

“成功老龄化”更多强调老年人在生活上的“成功”,带有较为强烈的价值判断色彩,但本质上还是将老年人视为社会与经济负担的“负担”和需要被解决的“问题”,因而受到学术界与公共部门的批判^[18]。与之相伴随的避难所式养老社区存在典型机构化设施特征。其内部功能空间,如食堂和卫生间在空间组织上存在集中化特点,配合长而宽的走廊,便于对入住老年群体进行集中化管理。老年人的起居、作息等日常活动也被进行集中化管理和规训,个体差异性和隐私需求则较少被强调^[19]。

2 积极老龄化1.0与聚居式养老社区

1987年,世界卫生大会提出“健康老龄化”的概念,在“成功老龄化”的基础上更加强调老年人身体健康与生活质量的提升^[1]。此后,美国一度出现“生产性老龄化”(productive aging)思潮,强调老年人的经济活动参与,认为老年人除了应满足自身健康需求之外,也应该参与到社会经济活动之中,并有所贡献^[20]。因此,社会应当为老年人提供健康安全的工作环境,充分发挥老年人在社会生产中的能量^[21-22]。“生产性老龄化”受当时西方经济发展的影响,带有鲜明的资本主义特点,也引发了对工业化

社会老年人角色变迁的辩论^[21]。1990年代后期,“积极老龄化”一词开始被WHO采用^[23]。相比于“健康老龄化”“积极老龄化”,这一概念认识到老年群体除了追求身心健康之外还存在其他更高层次的需求^[24]。总体上积极老龄化1.0时期的理念演变与实践进程受时代背景的影响交织发展,主要呈现如下3个特点。

1) 聚居式养老社区的出现。新自由主义思潮带来老年人社会身份的转变,聚居式养老社区随之出现。推崇自由化、市场化和行政干预最小化的新自由主义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经济一体化、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浪潮^[25],迅速席卷西方发达国家,以美国最为突出。受新自由主义影响,老年人的社会身份逐渐发生改变,被视为消费对象。以老年人为主要消费对象的银发经济(silver economy)在欧美国家蓬勃发展^[26]。受到这一思潮的影响,越来越多的老年人不再主动选择跟亲人或孩子一起居住生活。养老院等一系列机构化的养老机构成为老年人日常生活的重要环境,疗养产业(nursing home industry)迅猛发展,老龄友好型社区普遍以聚居式养老社区的形式出现^[15]。美国西部开始相继出现为年龄超过70岁的老年人服务的聚居式养老社区(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 CCRC)^[27],与之前避难所式养老社区不同的是,这些养老社区并非是为低收入老年群体提供医养服务的慈善机构。与之相反,老年人入住这些社区需缴纳价格不菲的报名费与月费,因而聚居式养老社区主要服务于高收入老年群体,将大多数中低收入老年群体拒之门外。

2) 建成环境与老年人生活之间的适配性。聚居式养老社区空间设计实践在这一阶段蓬勃发展。积极老龄化1.0阶段,世界各国开始出现了大量聚居式养老社区,受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相比于和家人共同居住,聚居式养老可为老年人提供更加舒适、宜居且专门化的生活环境,成为当时老年人的主流选择^[28],成为后来老龄友好社区的早期雏形。该时期最为著名的养老社区是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太阳城(Sun City)。太阳城共分为6大社区,规定所有居民的年龄必须超过55岁。为增加老年

人的归属感,社区委员会由老年业主组成。此外,社区专门为老年人进行设计,住宅以低层建筑为主,设有无障碍步行道及防滑坡道。低按键、高插座设置强调方便安全。针对老年人普遍记忆力、感知力下降的特点,社区内的空间具有极强的导向性,对方位感、交通的安全性、道路的可达性均做了安排,实施严格的人车分流。以太阳城为代表的养老社区模式是当时全美最好最典型的老年社区,成为了这一阶段老龄友好社区的典型代表^[15,29]。

除欧美发达国家外,同时期的部分亚洲国家也开始了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实践探索。1998年,新加坡首次推出乐龄公寓^[30]。乐龄公寓的户型设计及内部结构设计标准都体现了专门针对老年人的专门化考虑。在空间上充分考虑到了老人的身体机能情况和实际需求,在居室里所有方向和高度都有醒目的颜色加以提示。房间照明度、煤气开关上的字体大小以及报警系统的音量都区别于普通住宅。楼梯与走廊两侧都安装了扶手,开关、门窗等设施高度降低,方便老年人日常活动。此外,厕所与卧室的距离大大缩小,厨房灶台、水池和卫生间的洗面台下方设计成凹性,以供老年人在需要休息的时候可以随时坐下^[31]。

3) 老龄友好型社区对进一步“去机构化”的倡导。这一阶段的老龄友好型社区研究多聚焦建成环境与老年人生活之间的相关性^[32],特别是针对聚居型养老社区仍然过于机构化的特点进行批判。以Laws为代表的老年学学者对当时老龄友好型社区的一系列问题进行批判,认为当下的老龄友好型社区虽较早期避难所式养老机构在物质建成环境层面有了显著提高,从管理制度森严的规训机构变成了老年人自主生活的社区,但仍然在空间组织和管理模式上存在对老年人日常活动的监控和作息行为、身份认同的规训,应当进一步“去机构化”(deinstitutionalization)^[29]。不仅如此,这些聚居式养老社区大多具有较高的准入门槛,进一步造成了老年群体内部的不平等。此外部分学者指出,目前的老龄友好型社区更多集中在特定的城市区域,造成了乡村老年群体进一步的空间隔离和身份破碎化现象^[15]。

3 积极老龄化 2.0 与在地化养老社区

进入 21 世纪,全球共有 42 个国家 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比例超过 10%,除欧洲国家外,美国、日本位居前 20 位,老龄化国家开始迅速从欧洲向亚洲及拉美国家扩散^[33]。积极老龄化自 2002 年起开始从高质量转向多维度,步入成熟阶段。2002 年,WHO 出版《积极老龄化:从论证到行动》研究报告,提出“积极老龄化”是指在提高老年人生活质量的过程中,为其健康、参与、安全提供最有利的机会^[23],延续深化了“成功老龄化”和“健康老龄化”的内涵,分别从健康、参与、保障 3 个维度进行了深入解读,将老年人视为步入人生新阶段的社会群体,更加强调老年人在社会发展中的价值创造和身份认同,而非单方面强调老年人所能创造的经济效益。积极老龄化 2.0 时期的实践探索有了突破性进展,理论研究成果显著增多,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实践总体呈现出空间组织在地化、多学科交叉研究,跨部门合作特点。

1) 空间组织在地化。从“聚居式”到“在地化”,走向健康、参与、保障的老龄友好型社区。受社会经济条件的影响与老年人多样化的需求,在地化养老(aging in place),即在老年人原本的家和社区中养老以维持和延续原有生活方式与社会关系,已逐渐替代老年护理中心、聚居式养老社区等成为老年人的主流选择^[34]。2005 年,美国退休者协会(America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 AARP)的一项调查中显示:占比 88% 的年龄超过 65 岁以上的老年人均希望居住在自己家中,而年龄较高的老年人对居住在原有社区表示出了更加强烈的愿望^[35]。各国政府和国际组织开始支持老年人生活在社区,认为在地养老社区兼备经济与社会价值^[32]。欧美与部分亚洲国家的养老理念经历了从机构型、聚居式养老社区向在地化的老龄友好型社区转移^[32]。美国逐渐从传统的护理之家开始向老龄友好的社区服务模式探索^[15]。日本作为重度老龄化国家,聚居式养老社区难以满足大规模的老年

人口需求,因而提倡老人在自己家中养老,并加强与社区的互动^[36]。从代际关系角度出发,他们将住宅户型分为完全同居型、半同居型以及完全分离型 3 种^[37]。家庭可依据代际关系选择合适的户型。同时还按照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的老年住宅分为轻度、中度与高度适老化住宅^[38]。其中最为著名的是港北新城^[39]。港北新城的老少户住宅(二代居)、老人专用住宅、养老公寓等镶嵌在普通住宅中,借助完善的配套设施来满足老年人健康与精神层面的双重需求。通过将老年人住宅产品与其他住宅产品混合设计在一个生活社区内,使老年人的生活在有了基本保障的前提下更加丰富多彩^[39]。

2) 多学科交叉研究创新。欧美国家主导的老龄友好型社区研究覆盖了环境流行病学、老年学、城市规划等多个学科领域。环境流行病学与老年学聚焦于老年人与物质-社会空间环境之间的关系,认为老年人晚年的健康与物质空间环境紧密相关^[40-41]。城市规划领域的相关研究发现社区具有物质空间与社会环境双重维度,而居住在原社区的老年人需与社区中的其他群体和谐共存。城市规划师开始意识到包容性设计在保护社区异质性方面具有重要作用^[42]。设计的主要关注内容集中在社区内的空间营造,例如通过住宅建筑质量、街道活力、商店超市、基础设施、公共活动空间等来实现社区的可持续与融合,进而通过老龄友好的规划政策提升老年人的幸福感,并协调老年群体与其他年龄群体的差异化需求^[42]。2005 年后,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强调公众参与对老年生活幸福感的影响,提倡在空间环境中将物质与社会层面的服务设施相结合,为老年人提供更适宜的居住环境。更为重要的是,赋予积极老龄化新内涵的老龄友好型社区规划认为老年人不仅仅是被动受益于社区,还可以在社区中承担更为重要的角色。老年人丰富的人生经历可作为社区发展的支持力量,为社区发展发挥作用^[43-45]。

3) 跨部门合作建设。转变老龄友好型社区建设目标,鼓励跨部门合作。在积极老龄化及世界各国实践发展的推动下,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建设目标

逐步从简单的多元群体共存包容向注重物质空间与社会环境中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合作共赢转变^[15,32]。这一转变鼓励跨部门合作,并在社区管理上形成了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社区建设运营模式。例如,通过城市规划、住房、教育、医疗与社会保障部门之间的合作而实现老年群体的价值实现和多元群体的利益最大化^[46-47]。除政府部门之外,非政府、非营利组织及其他形式的民间组织也参与制定老龄友好型社区的行动方案^[48],共同将老龄友好型社区的议程纳入不同部门、不同政策和不同行动主体的视线范围。在纽约,当地政府、社区以及警察的工作与老年人之间紧密联系,以确保安社区的安全。这种支持给老年人更加了解社区的机会,同时也带来了安全感的提升和社会价值认同^[49]。

4 结论

积极老龄化理论发展至今,经历了由个体层面到社会层面,由强调老年人自理能力向追求老年人身心健康和社会价值实现与社会融合。与积极老龄化理论演进相伴随的是国际社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从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以及随之而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和批判。在社会转变过程中,老年人的社会角色也经历了由受到普遍

歧视的受抚养者逐渐转变为具有潜在经济价值创造力的生产者,再到具有潜在消费能力的能动消费者,最终转变为注重身心健康发展和社会价值实现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者(表1)。

与积极老龄化理论发展伴随的是有关老龄友好型社区研究与实践的不断演变。积极老龄化理念为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发展提供了发展方向,注入了新的活力。积极老龄化从初期到成熟阶段的实践大致经历了“机构化”到“去机构化”“聚居式”到“在地化”的过程,走向健康、参与、保障的老龄友好型社区发展理念。老龄友好型社区实践主要经历了从关注物质空间环境转向物质空间环境与社会环境并重的过程。提出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多部门合作,中央和各级地方政府对老龄友好型社区的推动起着十分重要的支持作用。在社区管理层面,为鼓励老年人参与到社区管理之中,各级政府和社区机构在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管理模式中联动,方可共同推动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正面临着快速、大规模的老龄化过程^[46]。目前中国的积极老龄化研究实践充分吸收了国际相关研究理论与实证案例的优势,较早明确了在地化养老的行动方针^[50],并且近年来逐步由单一关注老年人身体健康和自理能力逐步向关注身心健康和社会参与能力转变^[51]。老龄友好型社区的规划

表1 “积极老龄化”发展背景与核心思想

老龄观	时间	背景	核心思想
成功老龄化	1961年	欧美发达国家相继步入老龄化社会	从个体角度出发来探索应对老龄化的问题,反对老年歧视 ^[22]
健康老龄化	1987年	发达与发展中国家老龄化问题日益凸显之时	强调人进入老年阶段后尽可能的保持在生理、心理和社会功能的健康状态,将健康作为终极目标
生产性老龄化 (美国)	1982年	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美国及西方发达国家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快速发展	不仅强调老年人要有健康,认为老年人应参与社会经济活动并有所贡献。此观点较多出现在美国,欧洲等西方学者对此持保留态度 ^[21]
	1997年	在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提出	将老年人的社会参与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强调为老年人树立积极的社会参与心态
积极老龄化	2002年	世界卫生组织出版《Active Aging: A policy Framework》	提出老年人要积极面对生活,不仅保持身心健康,同时应参与融入到社会中,在社会发展中实现自我价值。分别从“健康”“参与”“保障”3个维度进行深入解读 ^[23]

设计实践也逐步从单一关注建成环境对老年人日常活动的刚性支持向社区物质、社会环境对老年人身心、社会参与的联合支持转变(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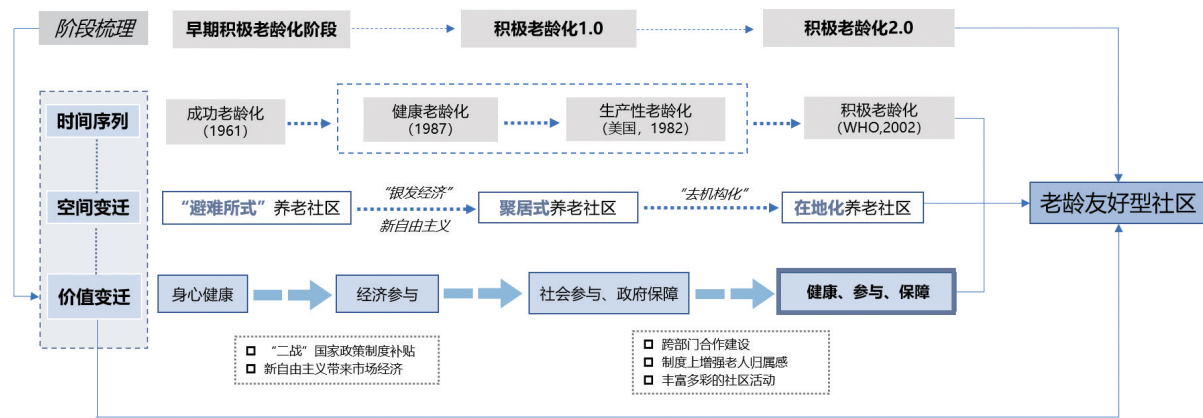


图1 老龄友好社区理论与实践发展历程

基于如上分析,提出以下研究展望。

首先,在地化养老已成为未来中国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发展趋势。然而,不同于机构化的养老社区,当前的社区建成环境如何适应逐步扩大的老年群体的差异化活动需求与社会身份认同,这是当前中国老龄友好型社区发展亟需考虑的问题。应当特别注意协调社区内不同年龄群体的共存与差异化行为需求,例如通过不同代际关系的适老化住宅户型、社区建成环境的包容性设计、社区社会软环境的营造以及社区层面生活圈的改造提升,处理好代际关系、为老年人营造适宜的在地化养老生活。此外,梳理东亚各国的老龄友好型社区实践表明,养老社区的空间营造需考虑当地文化、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29]。“安土重迁”“落叶归根”以及孝道文化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老年人对其生活环境的选择^[52],推动老龄友好型社区的社会实践需特别注意协调传统文化与当代城市社会转型之间的关系,实现不同年龄群体的共存和共赢。

第二,以欧美国家为主的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发展主要集中于特定城市和特定区域,但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发展与西方国家呈现出显著不同的特征,且现阶段中国居住和生活在乡村及偏远地区的老年人依然占较大比例。相比于城市,乡村及偏远地区

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医疗设施水平偏低、思想观念相对传统,对乡村地区老年人,尤其是留守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与社会关系问题考量相对欠缺。因此,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与村镇规划设计内容,中国偏远地区老龄友好型社区的研究与实践需及时适应当下的社会转型和内部要素变化,不可对城市老龄友好型社区进行简单复制。本文建议将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评估机制纳入中国城乡老龄友好型社区建设的全生命周期,确保评估的有效性与真实性,构建和强化老龄友好型社区与老年人之间的多重正向反馈机制。

第三,“去机构化”乃是目前各国老龄友好型社区发展的主流趋势。然而也有研究表明,现代通信技术的运用可能成为监控和规训老年人的虚拟机构,导致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再机构化”^[53]。当下,随着中国5G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智慧城市与智慧社区的建设,未来研究可以通过新技术的应用提升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54]。例如通过相机传感技术或集成式物联网设备和传感器为老年人构建智慧无障碍环境,提升老年人生活效率与安全性,为老龄友好型社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有效途径。但需要注意的是,老年人对新技术的接收能力有限,在不同年龄群体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需考虑到新

技术运用到老龄友好型社区实践的伦理问题,尊重老年人的主观意愿,保护老年人的个人隐私,调动老年人接收并运用新技术照料自身的主观能动性,避免新技术使用沦为监控和压迫老年人的工具。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1] 刘文, 焦佩. 国际视野中的积极老龄化研究[J]. 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 55(1): 167-180.
- [2] United Nations, Depart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al Affairs, Population Division. 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The 2012 Revision[R]. Volume I: Comprehensive Tables ST/ESA/SER. A/336.
- [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Global age-friendly cities: A guide[R].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7.
- [4] 《中国发展报告 2020: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发布 老龄化会带来新的转型发展机遇[EB/OL]. [2020-08-12].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9614995933455220&wfr=spider&for=pc>.
- [5] 翟振武, 陈佳鞠, 李龙.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大趋势、新特点及相应养老政策[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3): 27-35.
- [6] 谢宇, 谢建社. 本土化视野下的孝道价值观及其在社会工作中的运用[J]. 社会工作与管理, 2016, 16(5): 66-72.
- [7] 郭亚斐. 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基本特征及其影响[J]. 法制与社会, 2015(15): 228-230.
- [8] 构建积极老龄化政策支撑体系[EB/OL]. (2020-08-12) [2021-02-20]. <http://health.people.com.cn/n1/2019/0221/c14739-30851285.html>.
- [9] Greenfield E A, Oberlink M, Scharlach A E, et al. Age-friendly community initiatives: Conceptual issues and key questions[J]. The Gerontologist, 2015, 55(2): 191-198.
- [10] Menec V H, Means R, Keating N, et al. Conceptualizing age-friendly communities[J]. Canadian Journal on Aging, 2011, 30(3): 479-493.
- [11] Scharlach A E. Aging in context: Individual and environmental pathways to aging-friendly communities[J]. The Gerontologist, 2017, 57(4): 606-618.
- [12] Rowe J W, Kahn R L. Successful aging[J]. The Gerontologist, 1997, 37(4): 433-440.
- [13] Minichiello V, Browne J, Kendig H. Perceptions and consequences of ageism: Views of older people[J]. Ageing and Society, 2000, 20(3): 253-278.
- [14] Havighurst R J. Successful aging[J]. The Gerontologist, 1961, 1(1): 8-13.
- [15] Laws G. "The Land of Old Age": Society's changing attitudes toward urban built environments for elderly people[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3, 83(4): 672-693.
- [16] 井上由起子, 杨田田. 日本养老设施制度演变史[J]. 中国医院建筑与装备, 2016(5): 29-30.
- [17] Aging ISDO, Springfield. The community care program makes a difference. Annual Report to the Governor and the Illinois General Assembly on Public Act 81-202[R]. Fiscal Year. 1986.
- [18] 梁博娇, 陈功. 成功老龄化: 老年人主体地位的诉求与实现——仅以北京市海淀区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为例[J]. 劳动保障世界(理论版), 2012(8): 4-11.
- [19] Noguchi M, Ma N, Woo C M M, et al. The Usability study of a proposed environmental experience design framework for active ageing[J]. Buildings, Multidisciplinary Digital Publishing Institute, 2018, 8(12): 167.
- [20] Kerschner H, Pegues J O A M. Productive aging[J].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ietetic Association, 1999, 98(12): 1445-1448.
- [21] Butler R N, Gleason H P. Productive aging[M]. Springer, 1985.
- [22] Rowe J W, Kahn R L. Successful aging[J]. Aging, 1997, 10(2): 142.
- [23]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ctive aging: A policy framework[R].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02.
- [24] Kalache A, Kickbusch I. A global strategy for healthy ageing[J]. World health, 1997, 50(4): 4-5.
- [25] 邹铁钉, 叶航. 一个关于养老改革的外文文献综述——基于人口结构、决策环境以及新自由主义的视角[J]. 经济与管理研究, 2013(10): 31-42.
- [26] Ahtonen A. Healthy and active ageing: Turning the 'silver' economy into gold[J]. Policy Brief, 2012, 12(3): 2012.
- [27] Ayalon L. Perceptions of old age and aging in the continuing care retirement community[J]. International Psychogeriatrics, 2015, 27(4): 611-620.
- [28] 张强. 居家养老模式下老年人居住环境及生活行为的调查研究[D]. 上海: 同济大学, 2007.
- [29] Laws G. Embodiment and emplacement: Identities, representation and landscape in Sun City retirement communities[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1995, 40(4): 253-280.
- [30] Harrison B. Lean and mean: The changing landscape of

- corporate power in the age of flexibility[B]. Guilford Press, 1997.
- [31] 李忠东. 新加坡的乐龄公寓[J]. 社区, 2010(13): 57.
- [32] Lui C W, Everingham J A, Warburton J, et al. What makes a community age-friendly: A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literature[J]. *Australasian Journal on Ageing*, 2009, 28(3): 116-121.
- [33] 刘文. 人口老龄化的全球发展趋势[J]. 劳动经济评论, 2015, 8(1): 84-106.
- [34] Metcalf E R. Aging in Place[J]. *Saturday Evening Post*, 2010, 2(3): 17-26.
- [35] Pollak P B. Liveable communities: An evaluation guide [R]. Washington, D C: AARP, 1999.
- [36] 田原. 日本城市社区养老服务的经验与启示[J]. 当代经济, 2010(9): 40-41.
- [37] 富泽宏平, 周燕珉. 日本城市型三代居住宅空间设计策略研究[J]. 城市住宅, 2015(6): 30-35.
- [38] Makigami K, Pynoos J. The evolution of home modification programs in Japan[J]. *Ageing International*, 2002, 27(3): 95-112.
- [39] 钱伟忠. 新型花园城市——日本港北花园新城[J]. 园林, 1994(5): 44-45.
- [40] Cunningham G O, Michael Y L. Concepts guiding the study of the Impact of the built environment on physical activity for older adults: A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J].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2004, 18(6): 435-443.
- [41] Phillipson C. Urbanization and ageing: Towards a new environmental gerontology[J]. *Ageing and Society*, 2004, 24(6): 963-972.
- [42] Gilroy R. Places that support human flourishing: Lessons from later life[J]. *Planning Theory & Practice*, Routledge, 2008, 9(2): 145-163.
- [43] Wahrendorf M, von dem Knesebeck O, Siegrist J. Social productivity and well-being of older people: Baseline results from the SHARE study[J]. *European Journal of Ageing*, 2006, 3(2): 67-73.
- [44] Clark A. Building a good life for older people in local communities: The experience of ageing in time and place [J]. *Ageing and Society*, 2005, 25: 796.
- [45] Rowntree J. From welfare to well-being—planning for an ageing society: Summary conclusions of the Joseph Rowntree Foundation Task Group on Housing, Money and Care for Older People[Z]. 2004.
- [46] Harding E. Towards lifetime neighbourhoods: Designing sustainable communities for all: A discussion paper[Z]. Department for Communities and Local Government, 2007.
- [47] O'Neil A. Consultation response to DWP: LinkAge: Developing networks of services for older people[EB/OL]. [2021-01-20]. <http://www.jrf.org.uk/publications/consultation-response-dwp-lin>.
- [48] Yu Y. Healthy ageing in urban China: Governing the ageing population[J].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2021, doi: 10.1111/geoj.12372.
- [49] Steels S. Key characteristics of age-friendly cities and communities: A review[J]. *Cities*, 2015, 47: 45-52.
- [50] 毛佩瑾. 新时代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创新发展研究[J]. 行政管理改革, 2019, 0(11): 63-70.
- [51] 丁建定. 居家养老服务: 认识误区、理性原则及完善对策[J]. 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2013, 27(2): 20-26.
- [52] 卢义桦, 陈绍军.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老年人养老的变迁、困境与对策[J]. 湖北社会科学, 2018(8): 37-46.
- [53] Curtis S, Gesler W, Wood V, et al. Compassionate containment? Balancing technical safety and therapy in the design of psychiatric wards[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3, 97, 201-209.
- [54] Sims T, Reed A E, Carr D C.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use is related to higher well-being among the oldest-old[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Oxford Academic*, 2017, 72(5): 761-770.

Aging-friendly communities and active ag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ZHOU Peiling¹, LI Yue²

1. School of Architecture,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Shenzhen), Shenzhen 518055, China

2. 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The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i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active aging, which is used as a conceptual framework to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Combining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the practical cas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it is shown that the practical development of the age-friendly community experiences a transition from an “institutionalized” elderly care center to a “de-institutionalized” elderly care community, and then to the “aging in the place”. The axiology of the age-friendly community studies also undergoes a shift from providing the instrumental supports for the elderly by the physically built environment to providing both instrumental and social emotional supports by a physically and socially built environment. This process gradually involves the inter-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The age-friendly community studies based on the active aging concept provide both the scientific evidence and the practical impl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age-friendly community in the rapid aging trend in China.

Keywords active aging; age-friendly communities; social participation; multi-subject cooperation ●



(责任编辑 卫夏雯)